

“上海精神”引领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

□ 杨鲁慧

今年的青岛峰会，是上合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上海精神”再次得到弘扬，并更具有凝聚力，将引领成员国步入上合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

追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构建上合安全共同体

安全合作议题历来是上合峰会的重中之重，多年来，“上合力量”已成为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推动者。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肩负的安全责任更重，同时也承载着亚欧各国地区和平稳定更多的期待。

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指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优先方向。17年来，上合组织顺应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不断以创新理念探索新的集体安全合作模式。“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反映了后冷战时期人类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期望，对和平发展繁荣的迫切诉求，并成为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依据，代表了上合组织区域安全合作的新方向及新路径。

上合组织的安全共同体建设，核心是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青岛宣言》也强调：“成员国支持在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原则框架内采取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世界各地区冲突，以实现普遍安全与稳定。”亚欧国家在地缘战略上唇齿相依，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践行新安全观，打造地区安全共同体，共维稳定，共创安全，共促合作，共建繁荣，不仅符合亚欧地缘政治安全特点，也反映了亚欧国家普遍的利益诉求，更是中国倡导“新安全观”的目标所向。

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实质，是把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核心，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不再走冷战时期零和博弈及赢者通吃的老路、绝路。安全共同体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创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基石。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伙伴关系。亚欧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基础上的。习近平主席指出，17年来，我们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遵循与成员国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原则，展现了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要么选择联盟、要么选择对抗的二元对立世界观，走出了一条“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全球治理变革需要共同制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过程，是一个对话协商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同时也是密切伙伴关系和增强伙伴意识的过程。

营造亚欧各国安全共享的新型安全观。“安全共享”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和沟通协调的和平方式，处理和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对话增信任，以沟通化冲突，以协

商求稳定，以安全促发展，这也是“上海精神”内在的必然要求。“安全共享”谋求的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超越了传统的对抗性、军事性、谋求绝对安全的同盟理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不能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和不安定；一部分国家的安全，不能带来另一部分国家的不安和不安定；更不能以损害乃至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以谋求自身和联盟体系的绝对安全。归根到底，国际社会要止战维和，就必须摒弃冷战思维，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相互尊重与平等协商是“上海精神”的精髓所在，睦邻友好是邻国之间的相处之道。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宗教和文化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历史上领土纠纷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巨大，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我们更要求同存异，以协商对话凝聚共识，化解争端分歧，拓展利益汇合点，维护地区的长治久安，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亚欧地区是打造上合命运共同体的地缘战略依托，也是上合组织从亚欧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在打造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基础上，“上海精神”必将助推上合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以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积极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利合作机制，构建上合经济共同体

谋求各成员国共同发展繁荣，是“上海精神”的内在本质要求；加强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上合成员国立长远发展，从全球视野出发共同确定的重要任务。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上合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指出：“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青岛宣言》也强调：“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金融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特别是在当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世界经济面临种种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地域最广泛、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国际区域组织，上合组织以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积极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利合作机制，经济紧密型合作乃至升级版的经济共同体建设声势壮阔，具有了全球性的示范意义。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上合组织经济共同体建设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并为亚欧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特别是各国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极大释放了亚欧地区经济发展的潜能。在各个成员国的共同推动下，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支柱和驱动力。中国不仅是上合经济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且是重要的践行者。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累计投资超过852亿美元；2017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达2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年来，俄罗

斯、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落地最为集中、成果收获最多、最富有获得感的区域之一。这一切都与上合组织奠定的多边双边框架密切相关。

“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交相辉映，互为机遇，互为动力，共同发展，助推上合经济共同体建设进入“快车道”。青岛峰会树立共同发展、共创繁荣、共享利益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将有助于各成员国在共同发展繁荣中寻求利益分享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为全球政局稳定与发展繁荣提供有力借鉴。

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推动多元文化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构建上合文化共同体

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广泛凝聚命运与共的上合力量，不断拓展上合组织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打造综合性命运共同体，首先从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起步，同时也积极履行社会与人文合作方面的责任担当和务实合作。在人文领域，精心打造命运与共的上合传播，积极传递共谋发展的上合梦想，对外讲好民心相通的上合故事，积极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文化繁荣。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近年来，上合组织先后举办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和旅游等各种类型的会议，建立了上合成员国为主体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上合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明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只有交流互动才能更好地相互了解与彼此信任。文明交流互鉴的“上海精神”促进了当今世界多元人文交流，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推动多元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为新时代的上合组织提供了不竭的文化源泉。世界各国文化和文明的生机活力，就在于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以海纳百川和开放借鉴著称，曾将外来的佛教包容、凝练、融合为中国的佛学。现代又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广泛吸收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体现了强烈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文明源于中国，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拥有众多的不同民族和宗教，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文化和文明，各种文明文化与发展模式美美与共、相得益彰。从古至今，这种文明文化就在亚欧地区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和谐包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关键，就在于平等相待、彼此包容、相互借鉴，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排斥贬损他国文化。正如《青岛宣言》所言：“上合组织在睦邻、友好、合作、相互尊重成员国文化文明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念、开展信任对话和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树立了密切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典范。”以青岛峰会为契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将携手前行，建设更加紧密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并以此推动上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系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

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

□ 杜传忠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主要发达国家均在加紧布局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一定要抢抓机遇，重点解决芯片和算法技术薄弱、基础层布局不足、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短缺等“短板”问题，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当前，由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主要发达国家均在加紧布局，通过各种政策推动其快速发展，其中如下几点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积极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通过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加速和引导产业发展。如，美国在2016年10月连续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规划》和《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两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随后在2016年11月又发布了《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白皮书。日本在2016年1月开启“第五个科学与技术基础五年计划(2016-2020)”，规划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2017年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路线图，计划分3个阶段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以提高制造业、物流、医疗等行业效率。2016年，韩国提出了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在内的九大国家战略项目，作为发掘新经济增长动力和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引擎。

加紧制定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标准的制定一方面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实现互操作性的关键目标；另一方面，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进行规范，从而提高技术的可信度，促进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因此，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标准。如，美国在2016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规划》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制定。欧盟也高度重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标准制定，积极推进产业标准化立法工作。2017年1月，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通过一份决议，提出一些具体的立法建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提出立法提案。其中，一个提案指出，应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制定，通过建立相应的标准化框架，避免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标准不统一导致的欧盟内部市场分裂。

加强公共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大量且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作为训练基础，才能保证算法的不断改进和性能的不断提升。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积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更方便地获取有用的政府数据，这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早在2009年，美国就通过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对公众开放政府数据。2016年的《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中，又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公开数据”计划，将大量政府数据集对公众开放，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2013年，英国在《八国集团开放数据宪章——2013年英国行动计划》中，承诺将政府数据通过国家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uk”进行公开，希望依托开放式的国家数据门户网站构建国家级信息基础设施。

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带来对该领域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美国积极顺应这一趋势，计划将数字技术作为“新基础技能”融入教育系统中，并对其现有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具体包括：在中小学引入数字技能课程，以改善国民的数据知识水平，为学生学习更高级别的课程做好准备；通过种子基金、职业发展补贴、实习机会、奖学金及暑期研究实习等手段，对相关培训给予资金支持；依托高等院校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为工人扩展个人职业技能、退伍军人和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学习机会；在大学加强数字技术课程教育，力图培养顶尖的数据科学家。日本为加快数字人才培养，在2017年的“未来投资会议”上提出，从2020年起将编程列入中小学必修课程；从民间企业选派讲师到中小学授课，以促进产学研合作；对在职业院校接受社会培训给予更高的学费补贴；强化高等教育阶段的数字技术教育，以培养顶尖的数字技能人才等。

借鉴发达国家的政策措施，综合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我国应加快完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重点解决芯片和算法技术薄弱、基础层布局不足、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短缺等“短板”问题。具体说来，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构建和完善政府支持和保障机制。新兴产业的发展往往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蒸汽机革命中铁路的建设、电力革命中电网的建设及信息技术革命中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制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同时，应提供切实可行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在研发费用扣除及技术创新成果奖励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政府机构数据公开计划，逐步推动政府数据对公众开放，降低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成本。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芯片领域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发承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自主芯片技术。同时，制定采购国产芯片的管理办法，扩大国产芯片市场规模。

完善风险投资和服务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技术成果转化往往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高度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因此，出于安全性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对相关企业贷款持谨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成为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缓解创新活动流动性约束的有效途径。因此，应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科技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转化的重要支撑作用，着力解决当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畅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体系，为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创新创业提供孵化服务。同时，培养和引进能够深刻把握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的高端人才，为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增值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

加快推进芯片和算法等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首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尤其要大力推进芯片和算法等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调整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芯片和算法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集中组织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芯片和算法技术的基础研究。其次，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厚积薄发等特点，一般需要长期的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因此，要为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潜心钻研提供宽松向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加大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首先，尽快推动高校设立人工智能专业。应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一级学科建设，把增强人工智能素养贯穿于整个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适当增加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招生名额。在顶尖高校设立人工智能的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其次，加强高校与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合作。企业可与学校共建人工智能专业和课程，参与搭建学校实验室与配套环境，将业界经验和案例有机融入学校教学之中，并为学校的创新成果提供产业化渠道和机会。此外，可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优秀人才培养政策，充分利用现有“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加大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引进力度。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齐鲁策论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青岛峰会高扬“上海精神”旗帜，提出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新征程。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中，“上海精神”始终彰显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上海合作组织17年前诞生于中国，今年的青岛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也是继2012年北京峰会后，上合峰会再次重返诞生地中国。

经过多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能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中，“上海精神”始终彰显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上合组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超越了冷战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并成为凝聚上合成员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明确指出：“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继续“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时代的“上海精神”，必将成为引领上合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亚欧发展繁荣家园的根基与驱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构建周边或地区命运共同体起步的，上合组织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资源载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本质要义与“上海精神”一脉相承、相得益彰。17年来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高举“上海精神”这一旗帜，就能增进成员国的互信与团结，凝聚并激发各个成员国的积极合作意愿。可以说，“上海精神”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亚欧和谱家园的精神纽带。

中国是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多年来始终坚持遵循“上海精神”宗旨，在实践中不断为“上海精神”赋予新内涵和新特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历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重要讲话，都贯穿着“上海精神”，并多次明确提出要积极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再次强调：“上海精神”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以制度创新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 卢旭华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对于农村党建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应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创新，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实现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对于调动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夯实农村党组织建设，不断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乡村组织建设，需要我们积极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探索具有可行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新举措：探索建立村党支部党建专项基金。由县乡级组织部门会同街道制定规章制度，对村支部组织本村党员群众开展的党建阵地建设，以及参观考察、学习教育等党建活动由上级党委提供专项经费支持。每个村的重大活动必须提前写出规划，报上级党委审核，经审批合格后拨付一定资金。以此来帮助村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基层党建。

探索建立片区党建带动制度。片区小于社区，以一红旗村或党建优秀村为中心，学习跨村任职等模式的长处，以帮扶结对的形式，采取强村带弱村的方式，既可以缓解个别村支部书记工作经验不够的问题，又能帮助党建落后村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培育后备干部，逐步引导、促进落后村党建和集体经济的发达。

探索建立“两新组织+村支部”党建共进步制度。结合农村实际，把县域内企业两新组织的党支部与村党支部根据各自特点进



行组合，结对共建。可以互相学习党建经验，交流发展思路，共同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做到取长补短、交流互进。

探索建立“党群中心”制度。发挥农村“三老”等新乡贤的作用，把村里名望声誉高、热心村务的党员或群众，发展为党群中心户，上级党委政府和村里的一些议事会议可以邀请其列席参加，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政策宣讲、意见征求、说服帮助等方面有所作为。乡镇(街道)党委定期对这些中心户进行评议，设立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措施予以激励。

探索建立村落支部成员(村)主要负责人感谢制度。落后村出现的派性族性问题，大多是因为新旧班子不和睦造成的。上级党委要抓住选举刚结束时这一关键节点，由上级党组织出面选派支部成员进行组织谈话，通过情感抚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加强新老班子之间的配合，促进乡村工作的顺利开展。

探索完善“双轨制”第一书记帮扶制度。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基层党建组织威信的重要问题。第一书记制度帮很多村改变了面貌，但很多村仍只是完成了

“输血”式变化，缺乏“造血”式成长。完善第一书记制度，就是在强化“输血”的同时强调“造血”，双轨制发展，一是沿用传统上级派遣的思路，继续加大对落后村的帮扶；二是要形成制度，让乡镇筛选一部分特色村，根据该村产业发展方向，采用“点将法”向组织部门申请相关“专家”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帮助打造乡村品牌，发展乡村集体事业。

探索建立优秀党员(青年)创业扶持制度。设立村优秀党员(青年)评选标准，筛选建立乡镇级青年(党员)创业人才库，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扶持、项目引进、信息咨询、科技推广等措施，扶持年轻党员创业发展；设立党员创业帮助基金，以“无息贷款+基金有偿补助”的形式帮助创业党员(青年)解决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瓶颈。

探索建立村重大事项乡镇备案制度。现在有些村存在土地承包合同缺失、土地到期难回收、租金收缴无凭据等问题，因此，建议对于涉及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事项，村两委需以书面形式上报乡镇党委；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等，都必须上报乡镇党委存档，以此防止村主要负责人乱作为，预防矛盾发生。